



朱可夫元帅

MARSHAL ZHUKOV



〔英〕艾伯特·阿克塞尔 (Albert Axell) 著 刘亚华 张国良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朱可夫元帅

MARSHAL ZHUKOV

【英】艾伯特·阿克塞尔 (Albert Axell) 著
刘亚华 张国良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可夫元帅 / (英) 阿克塞尔著; 刘亚华, 张国良译.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150-998-7

I. ①朱… II. ①阿… ②刘…③张 III. ①朱可夫(1896~1974) - 传记
IV. ①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5211号

Copyright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3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1 by Portico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Marshal Zhukov*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所有

声明: 本书译自国外公开出版物, 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为作者本人持有。本社出版翻译其作品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或赞同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 任何人不能以此为由指责或攻击本社或中国政府及军方。

书 名 朱可夫元帅

著 者 [英] 艾伯特·阿克塞尔

译 者 刘亚华 张国良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120)

印 刷 北京九歌天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5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50-998-7

定 价 52.00元

致 谢

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作者采访了多位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殊死搏杀过的苏联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 1941—1945 年期间与朱可夫并肩作战，或者在他的麾下听从调遣。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俄国内战、西班牙内战和 1945 年的对日作战，还有一些人也像朱可夫那样从一名骑兵开始自己的戎马生涯。他们中有许多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强攻柏林。他们是：空军元帅谢尔盖·鲁登科、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大将伊万·沙夫罗夫、阿法纳西·别洛博罗多夫、M.I. 别洛夫、I.G. 帕夫洛夫斯基、L.S. 斯克维尔斯基、阿列克谢·扎尔托夫、达维德·德拉贡斯基、谢苗·彼得洛维奇·瓦夏金、M.M. 伊万诺夫……。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战争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身负重伤，有的负伤两次、三次甚至四次。在他们中间，不乏思维敏捷、学识渊博的将军。曾经有六七位将军邀请作者到他们的家中做客。在他们书架林立、书香扑鼻的书房里，摆满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们的巨著。

2002 年，在作者写作本书时，俄罗斯科学院的两位专家——俄罗斯历史学家国家委员会主任兼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历史学家米哈伊尔·米雅戈科夫博士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同时，在此还要向朱可夫元帅的两个女儿埃拉和伊拉致以深深的谢意。在莫斯科采访期间，作者就元帅的生活提了许多问题，得到了她们不厌其烦的解答。除了向作者提供大量的家庭生活照片之外，她们甚至还把一些贴在起居室墙壁上的照片揭了下来，方便作者复制。

在本书中，德国人对于朱可夫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看法主要来自那些曾经到过苏联战场的纳粹国防军们的文章或自传。这些人包括：海因茨·古德里安、哈索·冯·曼陀菲尔、弗朗茨·哈尔德、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冈瑟·布鲁门特里特和汉斯·道尔。

在研究朱可夫的生平时，各种各样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者在此向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和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包括极富盛誉的报纸图书馆）、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俄罗斯和苏联联系研究协会、瑞士科蒂奇图书馆和美国西汉普斯特德图书馆的职员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英国、爱尔兰、俄罗斯和德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们非常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且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谨向长期以来支持和鼓励作者的朋友和同事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在此，仅列举出他们中间少数几个人的名字：V.V. 马卡洛夫、安·帕维特、珍妮特·Q·特雷洛尔、约翰·黑尔－怀特、尼古拉斯·吉布斯、罗纳德·詹姆斯·雷恩、巴利·霍姆斯、德米特里·沙拉诺夫、杰伊·阿克塞尔班克、多米尼克·弗拉佩尔、马丁·布莱克维以及俄罗斯《镜报》编辑保罗·科尔斯顿。

最后，谨向伦敦朗曼公司（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精明强干的编辑班子成员卡西·米恩、安娜·瓦因格莱德、马格达·罗伯逊以及技术编辑彭德尔顿·坎贝尔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目录 Contents

- 导言 穿越时空：探寻真实的朱可夫 / 001
- 1 磨砺岁月：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 011
- 2 沙俄骑兵：旧军队中的当兵经历 / 019
- 3 新生政权：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 029
- 4 扬威蒙古：哈勒欣河一役成名 / 043
- 5 巴巴罗萨：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 / 055
- 6 无路可退：“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 069
- 7 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的革命摇篮 / 081
- 8 地狱熔炉：英雄的斯大林格勒 / 091
- 9 库尔斯克：纳粹的“滑铁卢” / 103
- 10 横扫千军：白俄罗斯战役 / 109
- 11 强击柏林：朱可夫军事生涯的巅峰 / 119
- 12 坟墓婚礼：希特勒夫妇的末日演出 / 133
- 13 暗箭难防：朱可夫遭遇构陷 / 139

14 君臣之间：斯大林与朱可夫 / 151

15 咎由自取：贝利亚的覆灭 / 163

16 机关算尽：“老大哥”与朱可夫 / 169

17 异国知音：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 / 175

18 力量源泉：妻子和女儿们 / 189

19 爱的归宿：第二次婚姻 / 201

20 将星陨落：永远的怀念 / 207

后记 人间正道：俄罗斯设立“朱可夫勋章” / 211

参考书目 / 225

导言

穿越时空：探寻真实的朱可夫

父亲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磨炼，但这种生活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并且锻造出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

——玛莎·朱可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叱咤风云的各国将帅之中，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沉重打击的人，在西方却鲜为人知。最近，作者通过对图书馆馆藏图书目录的调查发现，关于蒙哥马利生平事迹的传记至少有 65 部，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有 190 部，关于麦克阿瑟的有 79 部，20 多部关于阿兰·布鲁克（大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30 部关于韦弗尔，45 部关于巴顿；在德国方面，有 8 部关于曼施泰因，16 部关于古德里安，50 多部关于隆美尔。然而，关于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这位曾被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后出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赞誉为在军事上击败纳粹德国的各国将帅之中贡献最大的人的传记却仅有寥寥 3 部。

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即使是在他自己的国度里也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很少被媒体和公众注意或提及。他在击败希特勒军队的伟大胜利中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在官方历史中被忽视、贬低甚至抹杀。历史学家瓦西里·莫罗佐夫指出，在此期间，官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朱可夫在情感上遭受了“极大的创伤”。另一位历史学家维克托·安菲洛夫把对朱可夫的迫害评价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手下的“政治审查员们的邪恶图谋”。然而，就在俄罗斯重新将 17 世纪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8 世纪的苏沃洛夫、19 世纪的库图

佐夫等人视为民族英雄的今天，朱可夫（1896—1974）这位备受争议的苏联元帅也逐渐被视为一名民族英雄。

朱可夫经常被人指责过于严厉……毫无疑问，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维克托·安菲洛夫这样说道：

他确实严厉、苛刻甚至冷酷。为了击溃敌人，他奉献出了全部的身心，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期望他的部队能够勇往直前，不仅仅因为严格的纪律，更多的时候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1941年11月21日，在罗加乔夫镇争夺战期间，他向第8坦克旅指挥官罗特米斯特洛夫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要求你至少再坚守罗加乔夫镇24小时，不要说你做不到。”

“‘不要说你做不到！’”安菲洛夫说：“从这句话，你可以领略到朱可夫的指挥艺术以及他对于人类心理的准确把握。”

在整个军事生涯中，朱可夫一直因为对部队“过于严格”甚至“过于苛刻”而备受批评。朱可夫坚持要求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必须非常出色地完成。对此，历史学家巴迪亚金强调指出，元帅首先为自己确立了最高和最严格的标准，“这就给了他道义上的权利去要求他人”。在谈到朱可夫事必躬亲的严谨作风时，巴迪亚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进行说明。当时，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巴迪亚金在战后的主要职责是撰写每年一度的战斗训练报告，而后呈送军区司令员朱可夫审阅。“我们通常两周后取回那些报告，你简直难以想象……朱可夫元帅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评语和指示。而且，他每年都要亲自处理数量惊人的此类报告。”他说，朱可夫从来不推诿任何一项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分内之事”。

朱可夫极其尊重历史事实。他在苏军报刊《红星报》上曾经这样说道：“时间将会还原所有事实的真相，并将公正地评判每一个人……要想更好地服务于你的人民，只有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并为之奋斗！”安菲洛夫解释说：“朱可夫认为，不但要用眼睛观察事实，还要勇于承认事实。例如，在我们抵抗纳粹德国侵略战争的初期，敌人非常强大，不但准备充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在上述方面我们是难以与其抗衡的。他还认为，用‘大溃退’来描述我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要比用‘被迫撤退’更为准确和更加符合历史

事实。”

朱可夫是一个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的人。朱可夫最小的女儿玛莎说，父亲教育她们姐妹几个永远不要向困难低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听天由命是一件最可怕的东西。父亲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磨炼，但这种生活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并且锻造出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

经常有人指责朱可夫无视士兵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因为在东线战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即拳击比赛中公平竞争的规则），同时，他所面对的纳粹侵略军也是历史上最为冷酷无情的一支军队。（希特勒的爱将弗朗茨·哈尔德在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东线战场，今天的严厉是对未来的仁慈！”）毋庸置疑，当时的许多战地指挥官都可以被指责为“草菅人命”，但朱可夫却是遭受这种非议最多的人。事实上，也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朱可夫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与斯大林据理力争，有时甚至要求取消某项作战计划（详见第15章）。除此之外，东线战场的战线长度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数百万军队沿着一条漫长曲折的战线展开部署，其长度相当于从纽约州到佛罗里达州的距离，或者从伦敦到阿伯丁路程的两倍。

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一双从无边眼镜后面透射出睿智目光的灰蓝色眼睛，一位社交场合豪爽的饮酒者和步伐优美的舞者，一个从不抽烟的人，这就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但是，在许多同事眼中，他却是一个简单、粗暴、固执、傲慢的人。1930年，一位未来的元帅、一个非常熟知朱可夫的人——罗科索夫斯基这样评价朱可夫：“意志坚强、果断干练”，但却“过于严格、不够敏锐”。一年后，朱可夫受到了另外一位高级军官更加严厉的批评，说他对待属下“极为苛刻和粗暴”，此人就是俄国内战期间著名的哥萨克英雄布琼尼元帅。同样，在被俄罗斯人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过于严格”这个针对朱可夫众口一词的评价几乎贯穿始终。的确，朱可夫非常无情，有时甚至极为冷酷。对于以上种种指责，朱可夫本人并没有予以否认，但强调这些做法都是极其正当的。此外，他还承认自己有时候在言语上的确过于尖锐、粗鲁，没有考虑到被批评者的切身感受。但是，他接着辩解说，当成千上万条生命处于生死攸关之际，当一场大规模战役激战正酣之时，一位真正负责的军事指挥官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咬文嚼字的。

诚然，朱可夫有着自身的缺点，并因此在国内外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中广受批评。人们普遍指责他脾气暴躁、爱慕虚荣、居功自傲。更甚者，一位西方作家甚至攻击他“品行不端”、“睚眦必报”。但是，在所有熟悉朱可夫为人的西方同行或他的同胞之中，没有一个人发现朱可夫存在这些缺点。

一种针对朱可夫的更加微妙、深层的批评出自一位英国人之口，他就是曾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戴维·凯利爵士。凯利说：“他在以下基础上具体阐释了红军的军事学说……认为必须发展一种专制主义的计划经济；认为军事指挥艺术是党的路线在军事事务中的具体应用；坚信所有的战争根源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消亡，否则战争永远不可避免。”

然而，在以上所有的批评之外，存在着另外一个格奥尔基·朱可夫，一个更加平易近人、更为友善、更富人性化的人。蒙哥马利元帅的参谋长——陆军上将弗朗西斯·甘冈爵士评价说，朱可夫身上洋溢着一种“友好且令人愉快的人格魅力”。美国作家约翰·冈瑟战后与朱可夫见过几次面，他评价在自己见过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之中，朱可夫有着“一张最友善、亲切的面容”。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说自己与朱可夫“志趣相投”，甚至“一见如故”。

从战场下来，朱可夫是女儿们心目中慈爱的父亲。在紧张的战争间隙，只要有可能回家一两天时间（往往是在战场上对敌人取得一场重大胜利之后），他就会与妻子和女儿们一起谈谈心、聊聊天，给她们带来家庭的温馨和快乐。有时，他还会假装严肃地用手风琴演奏上一曲传统的俄罗斯歌曲。

在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共同管制德国期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与朱可夫密切合作过一年时间，他认为自己与朱可夫在政治信仰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并在这一问题上经常坦率地交换意见，且从未因此影响到彼此间的公务往来和精诚合作。在战后一段时期，经常有人评价朱可夫是“一个最好的苏联人”。此外，在与新闻记者的交谈中，一位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曾经这样评价元帅与其他苏联高官之间的区别：“朱可夫是所有苏联高官之中唯一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他也许会回避一些问题，但从不撒谎。”

朱可夫的战略才能引起了美国一位军事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编辑汉森·W·鲍德温的注意。他经过研究指出：1939年夏季，朱可夫首次领受重大使命前往蒙古迎击日本侵略军，他第一次在实战中指挥大规模的装甲集群作战，

验证了将古老的骑兵战术应用到装甲部队——实施纵深突破、扩大侧翼包围、迅猛突击、快速机动和集中火力的可行性。

1945年6月，遵照斯大林的安排，朱可夫担任阅兵首长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式（历史上的征服者总是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后来，朱可夫在回首往事时，始终称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朱可夫元帅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出现在阅兵场上的时候，包括空军飞行员、坦克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官兵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许多观看过胜利阅兵式纪录片的人认为，那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一次阅兵式。阅兵式接近尾声时，200名身穿崭新制服的红军老兵在雄壮的鼓声中，将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抛到了列宁墓前被雨水打湿了的台阶上。

朱可夫的名字与战场上的重大胜利几乎如影相随，他在回忆录中，对于其中的五六场胜利进行了着重阐述。人们一贯认为朱可夫在战场上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由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纳粹野兽在战争初期的迅猛攻势才被及时阻止并被最终击退，不得不蜷缩下来舔舐伤口。然而，一位美国作家对于这种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这位名叫戴维·格兰茨的美国人在他的作品《朱可夫最惨重的一次失败》（David Glantz, *Zhukov's Greatest Defeat*, 1999）中认为，朱可夫1942年秋季在莫斯科前沿输掉了一场“重大战役”，即所谓的“火星行动”。对此，一些军事和历史学家认为格兰茨在书中所使用的统计数字被严重夸大了，与史实不符。其中，有两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和米哈伊尔·米雅戈科夫博士）对于该书的批评最为尖锐。朱可夫本人曾经详细介绍了促使自己当时暂时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前往莫斯科前线的战争形势。当时，苏德双方均清楚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败将决定整个战争的进程。为了确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莫斯科以西地区实施“火星行动”，对德军实施牵制，防止其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部队增援斯大林格勒前线，确保苏军的大规模反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在“火星行动”期间，朱可夫不但全力以赴地协调在此作战的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同时还积极介入斯大林格勒的作战行动，协助制定了有关的反击方案。^[1]

许多东西方专家试图对朱可夫的军事才能进行评价。其中，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认为朱可夫身上集中了一名伟大将帅所应有的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包括：渊博的战略知识、出色的战术素养、高度的勇气、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巨

大的政治影响力等。但是，像其他作家一样，这个英国人也谈到了朱可夫对于人员伤亡的“熟视无睹”。

另外一位专家——印度军事历史学家 A.L. 塞西上校评价说，朱可夫在 1939—1945 年间的所有军事活动，诸如在蒙古反击日军、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坦克会战和柏林攻坚战等，都打上了“军事天才的烙印”。塞西认为，朱可夫不仅在他自己的战场上“战功卓著”，还在 20 世纪的大规模兵团作战艺术领域内“首屈一指”，其成就超越了任何一位将帅。塞西指出，在苏联以外，有许多将帅的知名度比朱可夫高得多，例如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戴高乐等人。与此同时，他还把朱可夫从一个穷鞋匠的儿子成长为苏联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人生经历称为“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奋斗历程”。^[2]

在仔细审视那些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时，美国传记作家菲尔·格拉布斯基在其名著《伟大统帅》（Phil Grabsky, *The Great Commanders*, 1993）一书中指出，曾经横扫了欧亚两个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统率的军队不到 10 万人，而击败纳粹德国的朱可夫元帅却指挥着数百万的军队。他认为，一个“光照千秋的将星”必须有轮廓清晰的战略、扎实稳固的补给、坚忍不拔的决心和光彩四射的人格魅力，朱可夫完全具备了这四种素质。

就在苏联红军遭受早期惨败后不久，朱可夫的名字便开始传遍德军战场的各个角落。据苏军军官回忆，他们曾经讯问德军战俘最害怕的是什么？对方通常回答：“苏联人的坚忍不拔……朱可夫元帅。”有时，他们也会提到被专家评价为战争中最优良的装甲武器——苏军的 T-34 型坦克。从德国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在苏军取得重大胜利的背后，有着骑兵出身的格奥尔基·朱可夫的身影。

1945 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了反希特勒战争的本质特征的问题，他总结道：“这是一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圣战！”的确，在你死我活的东线战场上，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妄图对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斯拉夫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而朱可夫和他的战友们则下定决心战斗到底，此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纳粹法西斯在苏联境内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譬如将成千上万座村庄夷为平地，修建不计其数的集中营和火葬场来屠杀苏联军民等，朱可夫和他的指挥官们并没有以牙还牙，进行彻底的报复，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谈到该如何对待纳粹犯下的累累罪行时，朱可夫这样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想

过让德国劳动人民来偿还纳粹暴徒在我国国土上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在如何对待普通德国人民的问题上，苏联人民采取了一种毫不含糊的立场：他们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彻底根除纳粹主义等方面需要（我们的）帮助。”

毫无疑问，在代表苏联政府管制柏林期间，朱可夫将会遭遇各种各样有关人性方面的两难选择，有的还需要他予以特别的关注。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朱可夫给所有当事人找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所罗门”式的解决方案。

有一天乘车路过柏林郊区时，元帅注意到一群衣着比较杂乱的人正围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孩子，还有一些苏军战士。朱可夫让司机停车，自己随后下了车向人群走去。起初，朱可夫还以为这些人是刚刚从纳粹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苏联人，结果却发现他们是一群柏林人。

我站在那里，一边观察一边倾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一名手里抱着一个4岁左右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德国男孩的苏军战士说道：“从科诺托普撤退时，我失去了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在火车里被炸死的。如今，战争结束了，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怎么生活呢？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他的父母都被党卫军（纳粹特别警卫部队）枪杀了。”还有人说：“瞧瞧，这孩子长得还挺像你呢。”

但是，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用德语说道：“不行，我不能把他给你，他是我的侄子，我要亲手把他抚养大。”

有人把这句话翻译给那名战士，他听后非常失望。

这时我插话说：“听我说，朋友，当你回到祖国后，还愁找不到一个儿子吗？我们那里有的是没有了爹娘的孤儿。如果你能找个有娘的孩子，那岂不更好？”我们的战士打开自己的背包，把面包、食糖和罐头肉分给孩子们和妇女们。那个被我们的战士抱在怀里的小男孩还得到了巧克力。那个战士亲吻了小男孩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可夫走到那名战士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当时朱可夫只穿着一件皮夹克，没有佩带肩章，但很快就被战士们认了出来，不得不在此逗留了半个多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朱可夫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我当时没有记下这些战士的名字，唯一能够记得的是他们都来自尼古拉·别尔扎林将军的第5突击集团军。”（战后出任柏林卫戍区



第一任司令员的别尔扎林在回忆自己的战斗生活时说：“在整整四年里，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还是在敌人的土地上，我始终难以坦然地面对毁灭、泪水和尸体。”)

作者研究发现，朱可夫与被誉为“俄罗斯的骄傲”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1730—1800)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苏沃洛夫征战一生，打了60场战役，从未有过一次失利。对于朱可夫，虽然没有人仔细计算过他一生究竟赢得了大小多少场胜利，但是，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西方军事家均对他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赞不绝口。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时，苏沃洛夫曾经回答：“我只知道我是一名士兵。除此之外，我既不了解我的出身，也不清楚我的血统！”

朱可夫把他的回忆录奉献给士兵们，奉献给他手下那些“敢于正视死亡的威胁和那些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朱可夫还高度评价了他的士兵们，当和平来临，他们又开始承担起繁重的生产劳动，在成千上万座的城镇和村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苏沃洛夫的军队从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样，朱可夫在训练演习中从未让他的军官们“轻松愉快”过，他往往一连数日甚至数周与指挥官和军士们吃住在一起，一直到对他们的战备状况感到满意为止。

苏沃洛夫对于平民和战俘总是怀着一种慈悲的情怀，对于那些掠夺扰民的手下则予以严惩，绝不姑息纵容。他经常这样教育部队：“有效地打击敌人依靠的不仅仅是武器，还有仁慈的对待。”在这一方面，朱可夫的立场同样毫不含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让德国劳动人民来偿还纳粹暴徒在我国国土上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有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格奥尔基·朱可夫只不过是一个“剪切拼凑”出来的英雄。由于有关他的传记里面通常缺乏人性的因素，他的人物形象因而也就缺乏一定的立体感和真实感。但是，从那以后，关于朱可夫真实面目的大量素材开始从书籍、报纸、杂志、文章、档案馆以及朱可夫女儿们的手中披露和涌现出来，人们终于得以认识一个真实的朱可夫。在本书中，作者希望通过为格奥尔基·朱可夫这个形象补充以往所遗失的人性的一面，激发起读者对于这位伟大但又充满争议的“俄罗斯之子”的新的兴趣和探究。

注释

- [1] 针对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戴维·格兰茨认为朱可夫 1942 年秋季在莫斯科郊外的“火星行动”中遭受惨败的说法，俄罗斯一位国际知名的苏德战争权威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教授进行了反驳，他指出：“‘火星行动’有着两个目的：第一，阻止德军从中央方面军群抽调兵力增援南方集团军群；第二，预防德军从勒热夫突出部（莫斯科以西 250 公里）向首都发起出其不意的突击行动。通过‘火星行动’，莫斯科在 1942 年的处境再也不像 1941 年秋季那样岌岌可危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战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勒热舍夫斯基教授总结说，这本书（《朱可夫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内容及其观点与真正的历史科学格格不入。米雅戈科夫博士指出，“火星行动”不但促成了“天王星行动”（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的成功，而且其自身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迟滞了德军对莫斯科方向一次意想不到的攻击。此外，“天王星行动”和“火星行动”实质上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极大地扭转了 1943 年东线战场的形势。2002 年，作者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采访上述两位历史学家时，他们均向作者提供了大量相关的资料。朱可夫夫人也曾指出，苏联最高统帅部在 1942 年夏季和秋季制定的作战计划，实质上是为了迷惑敌人，使其误认为苏军将在莫斯科以西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一场冬季攻势。果然不出苏联人所料，纳粹最高统帅部从当年 10 月份开始在该地区集结大批军队进行防范。
- [2] 1987 年，作者在莫斯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遇到一群苏联将军（他们都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询问他们如何评价朱可夫。陆军大将 I.G. 帕夫洛夫斯基回答：“朱可夫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甚至可以说是‘统帅中的统帅’”。他补充说明：“我们在战争后期共有 12 位方面军司令员，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朱可夫是其中最为卓越的一个，这一点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承认。”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别洛夫将军曾经撰写过许多关于朱可夫的文章，他认为元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官，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能够制定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并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予以实施；能够准确判断出敌人的意图并迅速调动兵力进行阻击；能够在关键阶段采取佯动举措诱骗敌人。

